

从研中海外
书究国外国

刘 东 主编

OTHER MODERNITIES

另类的现代性

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

Gendered Yearnings in China after Socialism

「美」罗丽莎 著

黄 新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刘东主编
周文彬总策划

OTHER MODERNITIES

另类的现代性

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

Gendered Yearnings in China after Socialism

「美」罗丽莎 著

新译

出版传媒集团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美]罗丽莎
著;黄新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5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主编)

ISBN 7-214-04373-4

I. 另... II. ①罗...②黄... III. 妇女—问题—研究
IV. D4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3325 号

Other Modernities: Gendered Yearnings in China after Socialism

by Lisa Rofel © 1997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6 by JSPPH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5-209

- 书 名 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
著 者 [美]罗丽莎
译 者 黄 新
责任编辑 府建明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奥能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10.75 插页 2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4373-4/D·640
定 价 24.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东

1988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

**献给格雷西娜
感谢她的爱与想象力**

一个对现代性进行跨文化研究的项目该怎样进行？殖民主义历史使“现代性”成为一个全球现象。但是“现代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否暗示现代性是源于西方的一系列分离的实践，被世界其他地方简单地照搬？它是否意味着还有一些地方等待着实现这一同样的身份，或者相反，现代性已将全球凝结成一个跨国界的整体？最后，我们是否应该把现代性理解为根植于特定历史文化中的本土实践？

这正是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初在中国进行我的人类学实地调查时所面临的问题。当时我前去研究后毛泽东时代社会生活的变迁，尤其是这变迁对于妇女的影响。就像研究中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我发现了一个我起初并没有准备研究而最终对我的命题很有帮助的问题，这就是对现代性的普遍关注。“现代性”被各阶层的人们热衷于谈论和争辩。这一从毛式社会主义向现代化社会的彻底转变开辟了一片新的社会空间，使人们得以创造一个自己心目中未来中国的新前景。从纯学术交流到街谈巷议，我遇到的人都滔滔不绝于他们对于“现代化”、“发展”、“西方”、“落后”、“进步”等的见解。知识界的朋友同我辩论自由市场经济问题，其他的人则对中国在通往财富和权力之路上的进程发表议论。我还分明记得有一天，一位在街上摆摊的老鞋匠在修理我的皮包带子的时候坚持要向我阐述他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正是这件事使我开始对人们所说的“现

代性”的意义加以关注。

这些讨论引导我用一种跨文化的方法来理解现代性。与前面提到的论点不同,它把现代性看作一种地域化的文化想象,它产生于东西方分界所带来的差别关系中并使其永久化。我尤其对被作为西方版世界历史的对象的西方人创造出来的“另类”的现代性感兴趣。这些另类的现代性既不仅仅是本土定制,也非一个普遍模型的简单翻版。它们是对那些被称为现代性的各色科学和管理项目的强行跨文化翻译。这些年来,我饶有兴趣地关注着新兴的关于现代性的人类学。它的两个隐含的假设使我吃惊,即现代性自发地产生于民族—国家之中,而且现代性在任何地方都导致同样的实践和效果。通过显示现代性如何在不同的文化地域被不同地想象,我希望我们可以重新思考这些假设。

本书追问以下基本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曾经是殖民知识的客体而现在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体的地方,对现代性的热烈追求是如何持续地激励着文化想象的?如何把握现代化项目中的模仿和从模仿中产生的多样性?对东西方差别的正常化如何造就了文化历史的特定性?在对现代性的想象中权力、能动性和主观性有着怎样的形态?

为回答上述问题,我对似乎被最近的研究所忽略的现代性的一些方面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这包括在全球想象的不平等交叉中进行的对现代性的话语构建,现代性如何指向一个延迟的渴望空间,现代性对他者的建构中的中心地位,在现代性名义下进行的项目的多样性,以及那些动摇了现代性的“真实性”的缺口和断裂。对这些领域的质询使我们能够打开那些裂缝,发掘出权力借现代性之名所扮演的角色。这样的探索需要一种精良的文化理论,它既不把文化看作一种固定不变的物质,也不彻底摒弃这一概念。20世纪后期本土和全球交织的复杂变化使这一任务变得迫切。我们必须学会创造性地思索如何挑战新自由主义关于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或者可称之为迷恋)。东亚和后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变迁中占据着

中心位置。这一迷恋的版本之一被塞缪尔·亨廷顿(1996)之流和新加坡政府所推崇,它认为是一种亚洲文明下的思维方式造就了资本主义在亚洲的成功。当然也有人信奉老的理性主义版本,即认为资本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沿着一条狭窄的经济路线运行的系统,不可阻挠地把后社会主义国家纳入它的轨道之中。为了取代这些复兴文化同质形象的假定,或者在社会生活的边界契入有意义的斗争,我们需要另一种文化研究方法。它追溯文化是如何被调用的,出于何种目的,同时也分析这文化中活生生的现实以及在这现实中围绕着生命的延续和实现而展开的意味深长的斗争,并将这些斗争视为这些本土/国际过程的中心存在。

在这项人类学研究中,我探索了中国自社会主义革命以来所进行的交叉重叠的现代性项目。从1984年9月至1986年8月,我在杭州开展了我的实地调查,并在1991年冬天重访了一些我当年调查过的人。从人们告诉我的他们1949年以后生活的故事中,我认识到历史和记忆在这些现代性项目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人们所遗忘的和铭记的社会主义的过去动摇了后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寓言。我于是在过去的文化想象和它们对于现在的充满争议的重建中往返追踪。虽然我从总体上同意福柯的观点,即对于现代性的召唤标志着与既有权力形式的决裂,我却发现当涉及到记忆时,这种决裂却不像福柯所论述的那样清晰划一。因此,在一个权力与以现代性的名义制造的知识交织的世界里,能动性、历史、主观性的复杂性成为我关注的对象。xiv

鉴于妇女在殖民主义关于他者的知识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不难发现性别问题成为中国政权成功想象现代性的中心。因此,性别观念、性别关系、性别实践成为我关注的重点。它们帮助我了解到遗忘和铭记如何将社会主义和后社会主义不断地交织在一起。当然我的论点不应该被理解为主张中国还没有达到与西方一致的现代性。相反,我想突破对现代性的认识空间,主张不仅仅要理解现代性如何继续使新殖民主义的差别关系正常

化,而且要理解现代性的断裂如何为挑战其权力提供了空间。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回忆历史”。我探索了“妇女解放”作为早期社会主义现代性的一部分的多重含义。这些含义在历史上有着多重的回声。对于老一代群来说,对照于她们当今的边缘地位,她们对于过去的记忆变成了一种怀旧。她们故事的双重性帮助我阐述和重新定义跨文化女性主义以及人类学对历史的书写。第二部分“不安的记忆”,从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挨了打的妇女的故事切入。她的故事动摇了试图对“文革”经验提供一种定论的霸权叙事。我进而主张与那个时代相应的现代性项目,即对权威持续的、革命性的挑战,还继续存在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人们的实践中,虽然他们拒绝毛泽东主义的特定政治。这一辈人继续与权威知识交战并动摇着其基础。在最后一部分“空间与主观性”,我转向年轻女性,她们几乎都是在后毛泽东时代的实现现代性的想象中成长起来的。我探索了国家鼓励她们获得一种“自然”的女性身份的
xv 实践。这些年轻女性既遵守又僭越规范的性别约束。从始至终,我描述了作为庶民工人的妇女们丰富的想象力,它们帮助我理解那浸透了权力的世界中错综复杂的、不可预知性的和创造性的机会。

在人名的使用上我改变了人名和我所谈到的人的少数生活细节。这样做主要是因为我想保护他们使之免于骚扰。我还遵从了用表关系词汇来称呼人们的做法。我用“师傅”一词加在老工人的姓后面,意思是“工人师傅”。我用“小”和“老”加在姓前面,意思是“年轻”和“年长”,人们通常在我面前如此称呼自己以体现一种彼此的熟悉关系。主任和厂长是官职,加在姓的后面。

我完成这个项目所用的时间意味着我的感谢名单长得足以环绕地球。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拨款使得我可以在中国进行我的实地调查。本书的写作得到了如下的支持: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提供的博士后奖学金,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的研究基金,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人文科学研究所给予的一个季度的长假,以及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我工作的研究所对我教学任务的削减。我感激以上所有帮助提供者的慷慨支持。

我感谢无数对本书的学术成就有所贡献的朋友、教师和同事。杰罗姆·格里德和埃里克·维德梅尔在我还是本科生时第一次激发了我对中国历史的兴趣。西尔维亚·柳樱、简·科利尔、唐纳德·当翰和基·威廉·斯金纳鼓励我在人类学的体系下探索知识的多样性。杭州大学的名誉校长李成慷慨给予我研究指导并使我的项目得以在中国进行。我还深切感谢许多阅读过或与我探讨过我的论著的人们。克里·沃尔克是我写作的 xvi 守护天使。没有她的帮助,我不可能专心写作。格雷西娜·戴维信教给了我她洞察世事的本领。朵云·近藤作为我的写作伙伴给予我持续的感情支持并与我共享她的智慧和敏感,是她伙伴般的不断鼓励激励着我前行。我还要感谢杰奎琳·布朗、贺萧、安娜·秦以及西尔维亚·柳樱,她们创造性的、批判性的积极参与极大地提高了我的项目的成就。安·安娜诺斯特、朵云·近藤和安吉拉·兹图对原稿进行了仔细的校对。我感谢她们所提出的中肯的修改建议。还有人文科学研究所召开的殖民主义和现代性研讨会与会者阪阳子、崔贞茂、詹姆士·藤井、藤谷隆、贺萧、胡志德、阿米叶·帕里、史书美、米里亚姆·西尔弗伯格和丽莎·米山等人,他们的参与使本书的撰写成为一段愉快的经历。我同时也感谢对本书各个章节给予了富有启发性的意见及曾就本书的主题与我进行商讨的其他人士。他们是:凯瑟琳·比迪克、戴锦华、胡缨、桑德拉·约肖、雷切尔·兰日罗提、刘禾,以及埃瑞克·马库斯。本书的写作还受益于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同事和学生们所提供的良好学术氛围。我还要感谢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编辑希拉·莱文和劳拉·居欧斯对我持续的支持和无限的耐心。爱丽斯·福克担当

6 另类的现代性

了艰巨的编辑任务,而我自己应对书中尚存的一些晦涩之处负责。我尤其要感谢我在中国期间一起生活过的人们(恕我不便披露他们的名字),以及从始至终支持我的伴侣格雷西娜;还有我的父母杰奎琳·罗费尔·伯格和赫歇尔·罗费尔,是他们教会了我抵制危险的美国中心论的诱惑。最后,我很遗憾我的父亲辞世过早,未能看到我今天所踏上的道路。

目 录

前言 / 1

导论 现代性及其迥异的渴望 / 1

第一部 回忆历史

第一章 解放故事 / 47

第二章 生产力的诗学 / 99

第三章 社会主义怀旧 / 129

第二部 不安的记忆

幕间 / 154

第四章 她 / 159

第五章 权威的诗学 / 166

第六章 渴望 / 186

第三部 空间与主观性

第七章 后毛时代的寓言 / 214

第八章 重新思考现代性 / 251

2 另类的现代性

尾声 / 271

参考书目 / 278

索引 / 307

插图

为人类学家摆姿势 / 45

午休 / 153

一家三代纺织工人 / 213

地图

杭州地图 / 46

振福厂地图 / 264

译后记 / 330

冷冽的寒风降临了冬天的杭州城。在不下雨的日子里天空是一种灰黄的颜色，寒冷侵入了我的每一个毛孔。但在我骑车去振福丝织厂的路上，这冻得人麻木的天气并不能阻止人们在街上忙碌。这是1986年的冬天，在过去的一年半里，中国政府谨慎地开始在城市地区推行一系列被称为经济改革的政策。它们是“四个现代化”^①的一部分，国家希望借此将中国拖出毛泽东时代，走向一个在新世界秩序里的领导地位。我住在城市边缘的大学里，就在著名的西湖的北边。西湖的美景曾为众多的传统中国绘画提供了灵感，并使她现在成为国内外旅游者的观光胜地。本世纪初从法国进口的雅致的梧桐树在这城市边缘的宽敞街道上遮天蔽日。在远处是新式的高层住宅。杭州两所最主要大学的已婚的教授和干部们都住在那里。再往下走，围绕着湖边的是别墅群。它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前曾经属于有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军队干部和他们的家人搬进了这里。据说曾经被指定为毛的继承人但后来密谋反对毛的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拥有过一栋在西湖南边的别墅，那里现在是一个涉外的三星级饭店。

每天早上我离开城里，骑着我的自行车出大学外宾招待所幽静的大门，穿过紧靠日益萧条的国营市场的熙熙攘攘 2

的“自由市场”。自由市场里挤满了从农村来的农民，叫卖着活鱼，活鸡，成堆的橘子和苹果，各种各样的豆制品和蔬菜。我骑车穿过街道，经过新涌现的营业到深夜的咖啡厅的霓虹灯，绕过湖的东边，穿过充斥着无数卖日用品的小商店以及主要是年轻男人在经营的出售最新时尚衣服的服装自由市场的城区，然后经过大多数中国人被禁止入内的为外宾服务的豪华饭店。而后我与街上比肩接踵上班的自行车流一起来到城区的东部边缘。这里一直以来是工人阶级的居住区。杭州的丝织厂都在这里。

城东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像迷宫一样的狭窄的街道。骑车人、公交车同能运载从混凝土板至新冰箱到年老的父母处的人力车或脚踏三轮车拥挤在一起。振福就坐落在这些很不起眼的交错的巷子之中。这些巷子里布满了平房，经常是一个房间就住了一户人家。这些房子具有这一地区的典型特征：倾斜的灰瓦屋顶和刷了石灰的砖墙。在城市的这些地方，我经常会在拥挤的人群中迷路并且几乎忘记自己是个外国人。在这样的地方，生活场景从狭窄的家里延伸到街上。公休的或者已经退休的妇女们坐在人行道上晾晒便桶、晾洗好的衣服或者织毛活。而年老的男人们则悠闲地下象棋或者靠着墙根晒太阳、睡觉。傍晚时，放了学的孩子们从屋里拖出书桌赶在天暗下来之前做功课。而在早上，工人们挤在人行道拐角处的早点摊上在上班之前急匆匆地吞下豆浆和油条。

振福丝织厂屹立在这样的一条巷子的尽头。它占据了几个街区，以围墙与居民区隔开。但许多在革命前被用作家庭作坊的低矮民房还紧紧地环抱着厂房的围墙，好像不愿意厂房里面的人们忘记它们的历史。在我到达振福那威严的大门之前，它那无孔不入的织布机和纺纱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已经指示了它的所在。年轻的男男女女涌进入口，急急忙忙地跨下自行车，开始上早班。他们头顶上的入口的上方有一幅

巨大的红色标语,上面写着:“我爱振福,献身四化。”

3

本书探讨 20 世纪晚期关于现代性的文化政治。它揭示在那些被标明为远离现代性的地方,而不是在通常被指认为是现代性的卓越发源地的欧美中心地区,现代性是如何被想象、追求和体验的。与许多近来人类学关于现代性的观点相反,我认为现代性持续地作为一种想象而存在,而且在关于在它者的类别里进进出出的人们的位置不对等的对话中,现代性作为一个打造各种全球/本土的主张、许诺和知识的不断转移的场所而存在。通过揭示现代性的想象空间,我们得以注意到现代性的断裂、分歧和不稳定性,以及“它者”如何动摇以现代性的名义取得的统治形式。^②这一空间里充满了在全球想象的交叉中形成的具有文化特定性的项目。

要了解那些生活在远离欧美的非中心地带(例如中国和日本)的人们对现代性的追求热情,我们必须认识到其特定的殖民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以及 20 世纪后期全球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大环境。人种学捕捉到了这些特定性。人种学对于特定性的强调不仅仅反映了其学科特性,更使我们得以向当前关于现代性和全球资本主义的理论提出挑战。

因此,接下来我所做的就是对后毛时代中国进行的不均衡的和充满争议的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中对现代性的想象进行理论化。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中国人民见证了一场急剧的社会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未来和过去同时成为尖锐的争论焦点以及各种极度张扬的希望、欲望、挫折的来源。我从那些在中国对现代性的追求中被置于“庶民”位置的人的角度来突出这一社会过程。“庶民”在这里指权力之下的那一类人群及其主体性。我同时也认识到那些认同于或者参与到对现代性话语空间建造的庶民群体就身在这权力关系之中而不是超然物外。^③他们以其庶民状态积极地进入、挑战和重新诠释对现代性话语空间的建造。虽然他们也信奉并被后毛时代的现代

4

性想象所影响,但他们的介入有时会不经意地撕裂了现代性那看似天衣无缝的“真实”。

关于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及其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如何体现的论争成为后毛时代关于现代性论争的中心话题,因此社会性别成为我的分析中的首要因素。社会性别在关于现代性包含什么的幻想中参与了权力关系的构建,而不仅仅是一个应当被考虑到或加入到现代性话语中的元素。我所说的“社会性别”在这里指暂时性的、非根本性的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的区分,这区分被映射到社会关系和身体上,定义了渗透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权力/知识关系。社会性别的划分不是统一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协商、冲突和变化的状态中的。因此我把社会性别看作是互动于而不是平行于其他形式的差别的,这包括阶级、种族、年龄(更确切地说是连续的政治运动所形成的代群)。

在后毛时代的中国,三代各具特色的女工相遇了。她们都各自形成了如杜博瓦和保罗·葛洛义(1993)所说的“双重意识”,即感到既置身于现代性之中但又不属于现代性。三代不同的女工以各自带着历史印记的迥异的方式定位她们自己与后毛时代现代性想象的各种交叉重叠的版本之间的关系。随着国家权力模式的改变和中国进入跨国资本的网络中,她们的政治信仰的谱系和记忆也经历了断裂。各种“政治信仰”的交叉重叠的意义是很具有启发性的,因为它们指向一种动态地把握现代性的方法。所有这些意义——政治经济信仰,对信仰主体的话语建造以及人们对这些信仰所作出的审判——共同作用在一起,暗含着对社会主义和后毛时代现代性想象的颠覆。^④因此,在此书中我把这种断裂看作是对我们所谓现代性寓言的揭露。我探求那种

5 即使是在国家完善的社会控制机制之下,仍能积极地创造文化形式的方法。

至少是在 12、13 世纪的南宋时代,作为南宋首都的杭州